

海外遗珍

大谷「探险队」与丝路文物

汪莹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副研究馆员

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如今学术上的热点之一。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进了中西方的商贸繁荣与文化交流，而起于十九世纪末、趁时局动荡之时，踏上丝绸之路的各国「探险者」则怀抱着各种目的。此次「海外遗珍」栏目介绍的是日本大谷光瑞策划的「探险队」，他们在西域探险途中盗取了许多名震于世的丝路珍宝，并将其带回了日本，后又流散各地。回望这些绚丽的丝路文物及其蕴含的深厚历史，或许能让我们再一次直面当时文物飘泊的伤痛……

西本愿寺，又称龙谷山本愿寺，京都十七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即便是面对同区域内建寺历史与京都同期的东寺、首任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居所二条城这样年代久远、声名显赫的寺院和历史遗存，位于京都中心区的西本愿寺也依然难掩风华。这座由日本战国时代著名政治家丰臣秀吉（一五三七年～一五九八年）于一五九一年建造的寺庙，是日本最大的佛教宗系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大本山（日本对各宗派根本道场之称）。寺内的唐门、白书院、黑书院均是日本国宝级建筑物，飞云阁更是与金阁、银阁并称「京都三阁」的日本国宝。作为佛教圣地的西本愿寺，于一六三九年设置了教私塾「学寮」，揭开了创建日本最古老的综合性私立大学——龙谷大学的序幕。

龙谷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佛教背景，在此后长达三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更因其深厚的历史感与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佛教学和西域学研究方面的中坚力量。在其拥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学、西域学文化遗产中，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家主大谷光瑞（一八七六年～一九四八年，法号镜如）「探险」所得的丝路文物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亚探险热潮兴起，世界各国的「探险队」纷纷涌入中国，对中国丝绸之路沿线进行名为探险实为偷盗的文物掠夺，使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除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外，由大谷光瑞策划、组织、资助的大谷「探险队」曾经三次深入我国西北，以偷取、盗掘、秘购等形式将古城、寺院、墓葬、石窟中的文书、经卷、壁画、佛像运回日本。与欧洲各国的「考察队」四处筹措资金，或是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资助不同，大谷「探险队」算是大谷光瑞的个人事业，「搜集品」也归他一人所有，通称为「大谷收集品」。「大谷收集品」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前后世界各国中亚探险活动中数量最大且最重要的「七大收集品」之一，现在分藏于日、中、韩三国。龙谷大学和东京国立博物馆是其在日本的主要收藏机构，收藏有《李柏文书》《众人奏乐图》《伏羲女娲图》等珍贵的丝路文物。

大谷光瑞二十二岁与贞明皇后（大



位于日本京都的西本愿寺

阅读链接

二十世纪初西域探险“七大收集品”

一、瑞典斯文·赫定“收集品”

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先后四次到中亚考察。他几乎踏遍了甘、新、蒙、藏，是第一个走访新疆一些古代遗址如塔克拉玛干、楼兰的西方探险家，盗取了古钱币、木雕佛像、陶器、丝毛织品等。斯文赫定的“收集品”现主要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

二、英国斯坦因“收集品”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三一年，斯坦因（Aurel Stein）先后进行了四次西域考察，在西域南道盗取了大批佉卢文、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汉文文书，并在敦煌盗取了大量文物。其“收集品”现主要收藏在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及印度。

三、俄国“探险队”“收集品”

一八五六年至一九一五年，俄国多次派出不同的“探险队”深入新疆进行考察，他们在西域北道盗取了大量佛教文书、壁画及其他珍贵文物，科兹洛夫 (P. K. Kozlov) 还在西夏黑水城遗址盗取数千件文物。

四、德国“探险队”“收集品”

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德国“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盗取了库车、焉耆、巴楚等地的多件精美古代艺术品和文献材料。

五、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品”

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四年，大谷光瑞策划三次深入中国新疆、甘肃、西藏等地的考察，盗取了大量古城、寺院、墓葬、石窟中的文书、经卷、壁画、佛像。

六、法国伯希和“收集品”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喀什、库车等地进行了考察，做了地质测绘，并盗取了佛像、钱币等文物；在敦煌时窃取了部分藏经遗书，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七、美国“探险队”“收集品”

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三〇年，美国派出五支“探险队”，盗取了大量壁画、经文、丝织品等文物，诸如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就因收藏了其中的部分珍贵文物而闻名于世。

正天皇的皇后）之姐结婚，成为大正时期（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六年）冉冉升起的华族（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前对日本贵族的称呼）。此后的五十年间，除了以「探寻佛迹」为名组织的三次「探险」之外，他更多地展现出热衷政治的一面。在晚清到民国的乱世之中，大谷光瑞与中国的联系从未间断。他不仅多次向日本当局进言，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日本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务，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僧侣、贵族、探险者、侵华支持者等身份带来的多面性，让他成为一位极富争议的历史人物，也必然使大谷「探险队」掺杂着更多复杂的因素。

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大谷光瑞策划并组织了三次深入中国新疆、甘肃、西藏等地的「探险」，足迹遍及天山南北主要城镇和古代遗迹，盗取了大量文物。他亲自参与的是一九〇二年的第一次「探险」，第二、三次「探险」则由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等人完成。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考察团不同，大谷「探险队」的这些成员并非学者，而是年轻的僧人。一般探险者在完成探险后会就自己的探险考察写出相应的科学的考察报告或是通俗的探险游记，前者凝聚了探险者对遗址、遗迹、遗物、时代、性质、意义、文化关联性的判断，是重要的资料记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大谷「探险队」中的



大谷光瑞肖像
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这些年轻僧人虽然配有指南针、温度计、棱镜罗盘、无水气压计等当时最先进的测绘仪器，但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对于丝路的所谓「探险」不仅没有关于发掘记录的详细报告，甚至连有关发掘品的发掘地点都没有详细记载，仅仅是成员根据兴趣爱好留下的少许日记。这种以盗宝为目的进行的「探险」，对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的第一次「探险」期间，大谷「探险队」到达了古迹众多的库车，对其周边的克孜尔、库木吐拉、苏巴什古遗址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察」（实为盗掘）。出土于苏巴什佛寺遗址的龟兹乐舞图舍利盒被认为是这次盗取的最为珍贵的文物。

库车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佛教经由西域传向中原的必经之处，曾有一个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名字——龟兹。如《晋书·四夷传》记述的那样，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被称为西域佛教中心并不为过。苏巴什佛寺就是「佛塔庙千所」中最大的一座。大谷「探险队」在库车搜集到的舍利盒表面绘制了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形象生动的乐舞图，与史料对龟兹乐舞中「苏幕遮戏」的描述两相印证，可以确定描绘的是龟兹古国苏幕遮节狂欢歌舞的一部分。盛行于唐朝的龟兹乐舞虽然古今闻名，但在此前未发现过形象化的记录。因此，这件舍利盒上绘有的精美乐舞图是十分罕见的，是反映龟兹音乐舞蹈艺术的珍贵图像资料，对于了解古代龟兹地区的世俗生活、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都是不可多得的实证，被认为是龟兹古国的稀世珍宝。

大谷「探险队」的第二次「探险」开始于一九〇八年，也是三次「探险」

阅读链接

龟兹的苏幕遮

◎ 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颯磨遮”。此戏本出西龟慈国，至今由（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一“苏莫遮冒”





七世纪　龟兹乐舞图舍利盒
通高三一·二厘米　盒盖直径三七·三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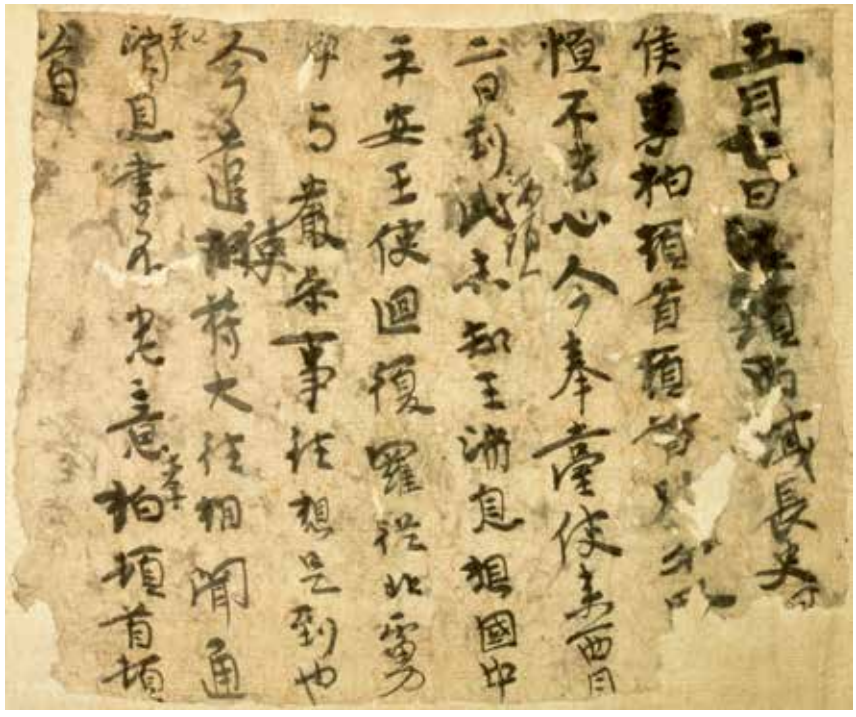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七世纪龟兹乐舞图舍利盒局部



四世纪　李柏文书之一
纸本墨笔　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四世纪　李柏文书之二
纸本墨笔
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中最为著名的一次。在这次「探险」中，西本愿寺年仅十八岁的年轻僧侣橘瑞超（一八九〇年～一九六八年）根据斯文·赫定提供的精确地理位置信息进入了楼兰遗址，成为继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之后第三个进入楼兰古城的外国人。橘瑞超在这次「探险」中发现了珍贵文物《李柏文书》，一夜之间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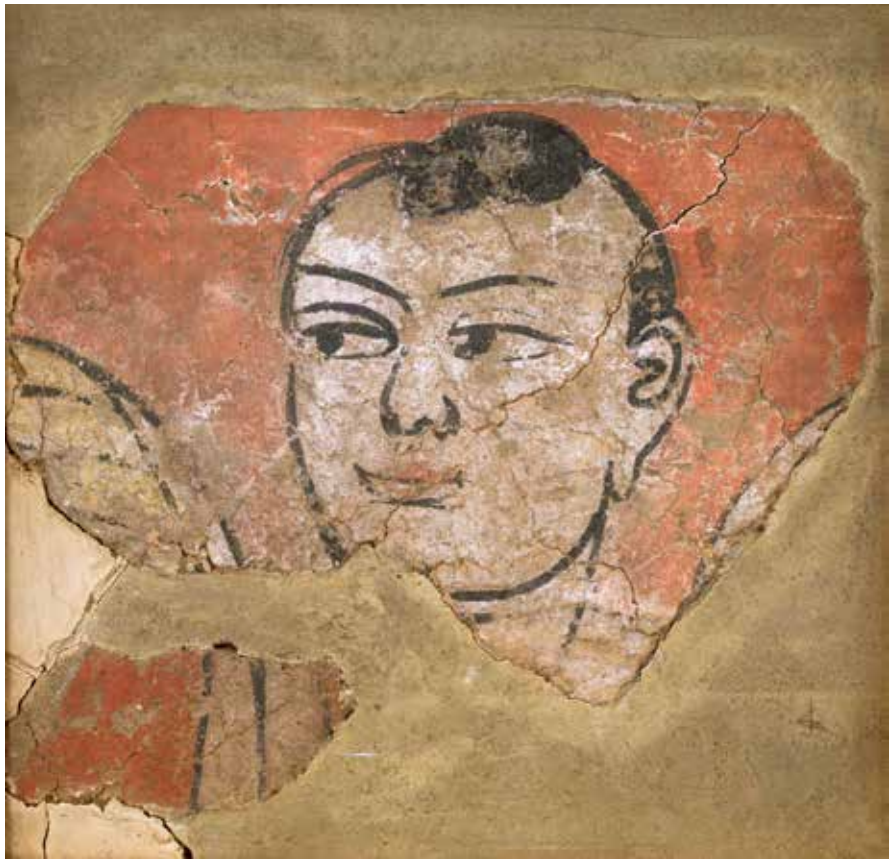
橘瑞超在自传《中亚探险》一书中这样回忆《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我第一次探险，实地考察了斯文·赫定所说古代楼兰遗址，获得了许多发掘品，在其南面遥远的地方，发现了两位博士都没有到过的两处古代遗址。」这样模糊的描述缺乏文物挖掘时的记录和出土地的资料，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供考古学、美术史学甄别的有效资料，《李柏文书》也由于这一原因至今仍存在出土地点的争议。（这再一次证明了大谷「探险队」乱挖乱掘，盗掠文物的本质）尽管如此，这件

文书的发现，在当时依然震惊了世界。

《李柏文书》写于公元四世纪，是前凉政权西域长史（统领西域诸国的长官）李柏写给焉耆国王信函的草稿。李柏的名字在《晋书·张骏传》中出现过，此件文书是已发现的西域文书中唯一名著正史的名人的手札，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由于它是目前已发现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日本著名书法家、汉学家西川宁考证其写于永和二年（三四六年），与王羲之的《兰亭序》时期相近，书体相仿，是研究当时书法发展情状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两年之后的一九一一年，橘瑞超再次来到新疆，除前往吐鲁番、楼兰等故地之外，还在米兰遗址中发现了壁画《有翼天子图》，后盗运至日本。米兰是自敦煌沿疏勒河通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的丝路南道上的要冲。一九〇六年，斯坦因在米兰遗址进行考察和发掘时，在佛塔的护壁上发现了一批带双翅的半身人物画像，并将其中比较完整的几幅盗运至伦敦大英博物馆。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有翼天子图》就是斯坦因当年挖掘米兰遗址时的遗留品。画像中长有双翼的青少年男子灵活而有神的眼睛、略有钩状的鼻头、光头上的发髻、浅圆领套头衣衫的形貌，体现了鲜明的希腊式犍陀罗艺术风格，是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交流的实证。

大谷「探险队」在第二次「探险」中还由野村荣三郎从柏孜克里克石窟盗走了壁画《众人奏乐图》。柏孜克里克石窟深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郊外的火焰山中，是高昌石窟中现存洞窟最多、壁画内容最丰富的石窟。二十世纪初，这里遭到纷至沓来的外国「探险



三～四世纪　有翼天子图壁画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家」的残酷掠夺，壁画被大规模地盗窃、切割、破坏，使柏孜克里克永远失去了这批宝贵的艺术珍品。现在，许多石窟都是千疮百孔、徒壁空墙，壁画则分散在不同国家，至今无法合体。野村荣三郎在其游记《蒙古新疆之行》中回忆了在吐鲁番盗取的经历：「雇了五个民工，到了四十七处洞窟，切割下七枚稍有观赏价值的壁画，还得了七个佛身……」这其中就有《众人奏乐图》，其残存的画面上是由伎乐六人组成的乐队，蹙眉瞪眼、环髻高耸，聚精会神地演奏着横笛、琵琶、铜铙、拍板、筚篥等乐器。壁画线条简洁流畅、着色协调匀称、画面神态激昂，生动传神地描绘了婆罗门外道闻讯佛涅槃后欢欣鼓舞的场景，堪称高昌壁画中的精品。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涉足新疆以来，大谷「探险队」就从未停止过在火焰山地区掠夺历史遗迹的脚步。除柏孜克里克石窟，大谷「探险队」还前往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盗挖。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是两个相距不远的村庄，汉唐时期曾先后是车师国、戊己校尉（西汉始置的掌管屯田事务的官职，隶属



十～十一世纪　众人奏乐图壁画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人绘　伏羲女娲图
绢本设色
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西域都护）、高昌郡、高昌王国以及西州府的属地，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泛布诸多古代墓葬。大谷「探险队」于一九一二年在墓中盗得的《伏羲女娲图》，共有十幅，目前分散于中、日、韩三国（两幅保存在旅顺博物馆、四幅保存在龙谷大学、三幅保存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另有一幅保存在日本天理大学），是古丝路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体现。

现藏龙谷大学的《伏羲女娲图》，保存伏羲女娲胸部以上部分，散落的星辰由短线相连，有序地布满星空。画像中对日月星辰的描画，体现了墓葬主人是背井离乡、生活在高昌地区的汉民，及其溯古求源、缅怀先祖，祈求与神明沟通的愿望。画像中朱砂、黄、青、白、黑的用色虽然单调却并不乏味，是两汉以来伏羲、女娲崇尚之风的延续。一九七二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主持对阿斯塔那墓群进行了第十次挖掘，在张氏家族茔地内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图》（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后来被证实与龙谷大学藏《伏羲女娲图》完全缀合，可以确认出土于同一墓室。（郑渤秋《吐鲁番阿斯塔那 225 号墓出土伏羲女娲图

与日本龙谷大学藏伏羲女娲图的缀合》，《西域研究》二〇〇三年第三期）这一发现，再次触动了人们对国家珍贵文物「身首异处」的痛楚。在神州蒙难的岁月中流落他乡的《伏羲女娲图》即使散落两处，也始终寄托着中国人民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情感，牵动着国人的心。

大谷「探险队」在阿斯塔那古墓盗取的另一幅墓室壁画《树下人物图》，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该壁画描绘的是一位在树下正要摘下面衣的男子以及双手捧男子衣袖正在伺候的年轻男侍从。男子头戴面衣，身着赭黄色宽松圆领衫，腰系黑色革带，腰间插一只笛子，下着阔脚裤，脚蹬乌皮靴。男侍从身着蓝色宽松盘领窄袖袍服，双手搀扶男子左臂，表现出两人的主仆关系。该图背面裱糊有《唐开元四年（七一六年）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和《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名山乡差科簿》，是现存西州户籍和差科簿中较长的一件，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池田温先生已录出全部文字，并且认为其可以和东京书道博物馆所藏的《高宁乡籍》和《名山乡差科簿》缀合起来，对研究唐代开元年间户籍制度、徭役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上述这些丝路文物仅是大谷「探险队」盗取品中的十之一二，却足见大谷「探险队」盗取之物的珍贵性。它们在一开始都被大谷光瑞带回了日本，大谷光瑞倚仗优越的家主之位以及西本愿寺兴旺的香火不仅为「探险活动」提供



唐人绘　树下人物图壁画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了有力的经济支撑，而且斥巨资于神户六甲山山麓修建二乐庄别墅，作为「大谷收集品」最初的集中存放地，并曾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举办「收集品」展览。不过，一九一四年二乐庄别墅的藏品整理才刚刚开始，大谷光瑞就因为西本愿寺的财政赤字问题引咎辞职，开始了以中国为中心、长达三年的海外「放浪」。二乐庄也被迫关闭，「大谷收集品」还未被系统整理，就开始了分散流离的命运之旅。一九一五年，大谷光瑞为了抵债，将二乐庄和其中的一部分「收集品」出售给日立公司的创始人久原房之助。这批藏品后被久原转赠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入藏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现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一九一六年，大谷带着余下的二乐庄文物移居旅顺，以寄存的方式将其存放在刚刚建立不久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一九二九年，这批藏品被卖给「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前身），正式登记入藏，成为二十世纪初被攫掠的西域出土品中最终得以留在祖国的唯一一宗，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大谷「探险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盗掘活动，使得很多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书、漆器、佛教石窟壁画、丝绸、绢画等珍宝显露在世人面前，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各界学者对丝路文化的关注。但是，正如著名敦煌学与丝路文明研究专家刘进宝所说：「……不可否认，这些探险考察活动，也破坏了中国的文物古迹，致使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被盗劫，造成了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一九一七年，「大谷收集品」中的丝路文物曾作为旅顺博物馆首次对外开放的展出文物与观众见面。二〇一七年，为纪念建馆一百周年，旅顺博物馆再次展出了这批文物。这些曾于民族危难时散落流失的民族瑰宝，辗转百年之后，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走向复兴的历程。

阅读链接

关东厅博物馆

◎《马关条约》后，旅顺大连地区落入俄国之手，俄国在关东厅博物馆的位置建造规划了“陆军将高校所”。尚未完成，日俄战争爆发，一九〇五年日本占领了旅顺大连地区，一九〇六年成立“关东都督府”，开始兴建一系列文娱设施。先在俄清银行旧址成立“物产列所”，后在此未完工的建筑基址上改建博物馆，名为“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后更名“关东都督府博物馆”。一九一九年，随着日本在东北地区实行军政分治，再次更名为“关东厅博物馆”，延续至一九三四年改称为“旅顺博物馆”。



二乐庄别墅旧影

图片取自《二楽荘写真帖》，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年）印刷